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北京文化通讯

2013年第11期
（总第17期）

本期要目

政策导览

■北京市发布《北京“设计之都”建设发展规划纲要》

■陈　冬：把着力点放在提升文化发展质量上

■张晓明：把握好文化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动态关注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圆满落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北京峰会开幕

媒体聚焦

■“鬼城”来袭：畸形城镇化发展需反思

■“土豪”重现：网络热词折射出时代困境

尖峰观点

■于建嵘：新型城镇化：权力驱动还是权利主导

■刘洁、苏扬：北京的城市病并非人满为患，而是人挤为患

海外视野

■韩国的“压缩型”城镇化之路

■日本城镇化的得失

研究院之声

■我院与民进中央召开“微文化”主题座谈会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Institute for Cultural Studies,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1. 政策导览

(1)政策文件

■ 北京市发布《北京“设计之都”建设发展规划纲要》

日前，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牵头编制完成了《北京“设计之都”建设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提出的远期目标是：到2020年，北京基本建成全国设计核心引领区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设计创新中心，“设计之都”成为首都世界城市的重要标志。“北京设计”的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设计产业年收入突破2000亿元，设计品牌认知度和创新能力明显增强，设计提升城市品质的作用凸显，设计人才队伍建设成效显著。《规划》提出的近期目标是：到2015年，初步形成国际设计资源聚集、设计产业加快发展、“北京设计”品牌魅力提升、设计有效增进民生福祉、设计人才荟萃京城的良好局面。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创建北京UNESCO设计创新产业中心等国际化设计机构，吸引50家以上国际著名设计机构和研发设计中心落户北京。设计产业实现快速发展，培育设计企业100强以及一批优秀中小型设计企业，建设20—30个“设计之都”示范基地，设计产业收入实现1400亿元，年均增长率不低于15%，从业人员达到35万人。设计品牌认知度和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推出40个知名设计品牌和一批优秀设计成果，“设计之旅”挂牌站点达100家以上，全市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年均增长率超过2%，达到7000件，设计单位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从2011年的123亿元增至300亿元。设计提升城市品质的作用更加明显，完成重点地区公共空间环境、公共基础设施以及城市景观和城市标识系统优化，首都人居环境和人民生活质量明显改观。人才队伍建设卓有成效，引进50位以上设计拔尖人才，支持本土设计人才的国际化发展，培养一批复合型设计人才，形成一支规模可观、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设计人才队伍。

《规划》确定的重点任务包括：(一)实施国际化工程，融入全球创新设计网络。(二)实施产业振兴工程，推动创新型经济发展。(三)实施城市品质提升工程，增强市民幸福感。(四)实施品牌塑造工程，提高“北京设计”认知度，打造品牌设计奖项：提高红星奖国际影响力，设立设计之都贡献奖。(五)实施人才助推工程，构建多层次人才梯队，推出设计拔尖人才，培养实用型设计人才，促进人才跨界交流。

(据首都之窗网站，2013年10月25日)

■《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正式发布

10月22日，《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试行)》(以下简称《预案》)正式发布，《预案》包括空气质量检测与预报、空气重污染预警分级、空气重污染应急措施、组织

管理方式及监督监管等几部分内容。

《预案》将空气重污染分为4个预警级别，由轻到重依次为预警四级、预警三级、预警二级、预警一级，分别用蓝、黄、橙、红颜色标示，预警一级(红色)为最高级别。预警四级时，提供健康防护提醒措施与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如提醒特殊人群减少户外活动，倡导公众选择公交出行等。从预警三级开始，增设强制性减排措施，减排内容逐级增多，主要包括加强道路清洗，施工工地停止土石运输、拆除施工，工业企业停、限产减排，全市范围禁止烟花爆竹燃放、露天烧烤等。当达到预警一级时，除上诉措施外，还将在实施机动车单双号行驶的基础上，再停驶全部公务车辆的30%。

《预案》还规定，当重污染预警启动时，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会派出督查检查组对各区县、各部门、各单位应急措施的组织落实情况进行抽查。督查考核结果将纳入对区县政府、市有关部门和市属国有企业的考核，对因工作不力、行政效率低下、履职缺位等导致未有效落实应急措施的，将依照相关法规追究责任。媒体和公众等社会力量可依法、有序监督各项应急措施的落实，对有关措施不落实、不到位等情况予以曝光。

（据首都之窗网站，2013年10月22日）

■ 北京市印发《北京市2013—2017年机动车排放污染控制工作方案》

为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促进空气质量显著改善，日前，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北京市2013—2017年机动车排放污染控制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提出的目标是：到2017年，中心城区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力争达到52%；全市机动车保有量控制在600万辆以内；全市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辆规模达到20万辆；加快老旧机动车淘汰更新，2015年淘汰全部黄标车；完善公共管理政策，在机动车保有量预计增加80万辆的基础上，全市车用燃油消耗总量比2012年降低5%以上，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25%以上。为实现上述目标，《方案》共制定了58条具体措施，涉及公共交通发展、机动车总量控制、机动车结构优化调整、加快老旧机动车淘汰更新、完善公共管理政策等五个方面。

在公共交通发展方面，将加快轨道交通建设，2015年全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力争达到660公里；完善地面公交快速通勤体系，研究北京市公交专用道施划地方标准，建设中心城区公交专用道网络，2017年公交专用道里程达到480公里；开展自行车道、步行道环境整治，2017年城六区90%以上不规范的城市道路自行车道和步行道达到规范标准；推广公共租赁自行车服务运营，2015年全市公共租赁自行车规模达到5万辆，区域内实现通存通取；提高中心城区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加大公共交通换乘体系建设投入，2017年中心城区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力争达到52%，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比例达到60%以上。

（据首都之窗网站，2013年10月29日）

(2)政策解读

编者按：不久前召开的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座谈会指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已进入新的阶段。如何把握新特点、新任务、新要求？有关专家对此进行了解读。

■ 陈　冬：把着力点放在提升文化发展质量上

改革依然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最大“红利”。在新的起点上，北京市以转变文化发展方式为着力点，确立了“五个发展”的路径，即：坚持融合式发展，实施文化创新、科技创新双轮驱动战略；坚持内涵式发展，提高整体质量效益；坚持集约化发展，提升园区集聚效应；坚持品牌化发展，增强文化企业竞争力；坚持国际化发展，推动文化走出去。为此，要积极探索提升文化发展质量的新举措。

改革的实质是制度机制创新，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努力形成“主角是人民群众，主体是丰富多元的社会力量，主导是政府”的文化发展新格局。从一定程度上讲，文化创造活力发挥得不理想，是因为政府管的方式不对，不该管的管了，该管的没管好。政府的作用应当是把全社会的文化创造力激发出来，促使文化主体更加多元、文化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发展环境更加优化，而不是包办一切，不是替代社会和市场发挥作用。在文化建设中要突出以人民为主体、以群众的需求为导向，不仅在内容和方式上服务人民，同时要强调让人民群众参与、让人民群众创造。目前，北京正在研究出台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政策文件，要搭建与首都地位相符、富有号召力的文化发展平台、文化创意产业服务平台，探索建立文化发展的长效机制，制定涵盖公共文化服务、文化创意产业、文化精品创作等方面的科学考核体系，激发各区县和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

创新才能让文化发展跟上时代，要加快内容形式业态上的融合创新。一方面，文化产品内容形式上的融合创新将创造巨大的艺术魅力和丰厚的市场利润。另一方面，在业态上，互联网技术以及跨界、并购、重组等市场行为深刻改变了行业大格局。在互联网技术带动下，文化和科技的融合能够创造新的市场和新商业模式。文化系统决不能对信息时代、大数据时代的巨变熟视无睹，应着力在产品内容和文化业态上创新。北京市文化局正和相关部门积极推动文化与科技、旅游、商务、金融等领域的融合发展。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要建设好现代市场营销体系。目前国内演艺业在销售渠道、营销发行方面存在严重的瓶颈制约，急需突破以提升产业格局。北京现已通过首都剧院联盟搭建覆盖主流媒体和互联网的演艺资讯发布平台，下一步还要向现代市场营销体系全面升级。

政策法规是最好的指挥棒。要着力构建激发全社会文化创造活力的政策体系，营造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推进文化政策法规保障工作的难点在于，要从文化部门的推动上升为包括人大、政协、财税、发改委、人事等多机构、多部门的联动和全社会的互

动。为此，需要提高认识、科学规划，特别是需要加大统筹力度。

■ 张晓明：把握好文化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当前，中国的文化产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把握新的阶段性特征，是制定新一轮改革政策的基点。

第一，文化市场已经从产品短缺走向短缺与过剩并存，要求文化产业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基于文化市场“超越短缺”这一基本变化，新的改革应该推动文化产业由传统方式发展转向数量与质量并增、转向主要依靠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以及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样化的文化消费需求来拉动文化产业发展。目前我们正处在两个阶段前后交替时期，需要具体地分析市场需求状况，灵活调整政策。

第二，文化产业发展动力正在从政府推动走向市场激励，要求文化市场加快功能和机制建设。要发挥好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进一步打破市场壁垒、建立良性的市场竞争机制；着力转变政府职能，从直接监管向间接调控转变；建设具有社会主义文化特点的现代企业制度，将发展的基础从政府支持转向市场竞争，使之真正成为文化产业的建设者和文化市场的主导者。

第三，文化产业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要求改革开启新的制度红利期，将文化产业融入国民经济发展的主流。这就要从企业财会制度、工商注册和税收制度，到市场交易制度、资产评估和产权交易制度安排等进行全面的调整和创新。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是文化市场合理化的技术细节建设，补市场建设不足的课。

■ 范卫平：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的攻坚目标

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攻坚的主要目标要从以下八个方面展开。

一、理顺文化管理体制，提高行政主体的宏观管理效能。推动政府部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实现管办分离；推动文化行政部门实行简政放权，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强化宏观调控职能，实现文化领域的科学管理、依法管理、综合管理。

二、健全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增强市场主体的竞争力。按照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的要求，巩固前一轮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成果，推动已转制文化企业在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基础上，实行股份制改造，探索建立法人所有制基础上的现代股份公司制度，鼓励条件成熟的企业上市融资。

三、建立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促进文化产品和要素合理流动。建立健全文化经纪代理、评估鉴定、保险、担保、拍卖等中介服务机构，制订完善知识产权、品牌等无形资产的评估、质押等办法，促进文化企业产权和版权交易。

四、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推进文化产业的战略性转型。加快转变文化发展方式，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由主要依靠文化产业规模扩张和文化产品数量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向主要依靠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共同提高的集约化、可持续发展方式

来拉动转型。

五、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完善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的创作生产、产品供给机制，加强服务网络、基础设施和保障体系建设；统筹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

六、发展现代文化传播体系，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围绕构建现代文化传播体系，制定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战略和全球布局规划，鼓励各种所有制的文化企业在境外创办文化机构、开展跨国经营，加强党报党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和重要出版社建设。

七、引导民间资本投资文化产业，激发全民创业热情和文化创新活力。鼓励引导民间资本以多种形式投资文化产业，在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和国有企业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积极探索民营文化企业有序参与文化建设的新途径、新模式，鼓励民间资本开办小微文化服务企业，鼓励民营文化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

八、规范文化市场秩序，营造文化事业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科技等手段，加强文化市场管理，规范文化市场秩序，净化文化市场环境，加强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开展诚信宣传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推进行业自律。

（据《文化体制改革三人谈》，《求是》，2013 年第 15 期）

2. 动态关注

■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圆满落幕

10 月 11 日至 26 日，由文化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在山东举办，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信祝贺。

“十艺节”坚持一流标准，塑造国家艺术形象；坚持办节宗旨，体现文化惠民；坚持勤俭办节，杜绝奢华浪费。作为综合性艺术盛会，“十艺节”的内容主要包括七个方面。一是文华奖评选，全国 87 台专业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参加评比演出，10 月 26 日在青岛市举行颁奖活动。二是群星奖评选，全国 353 件作品、35 支代表队参加群星奖 4 个门类的决赛，10 月 25 日晚在威海市举行颁奖活动。三是美术展览展示，在新落成的山东美术馆举办“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展出全国各地 3 年来新创作的优秀作品 647 幅。四是演艺交易活动，在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举办“2013 中国（山东）演艺产品交易会”和重点演艺项目签约活动。五是邀请演出，组织 2 台境外经典剧目、38 台国内优秀剧目进行展演和祝贺演出。六是开闭幕式，10 月 26 日晚在青岛大剧院举行闭幕式。七是文化惠民活动，“十艺节”举办地包括济南、青岛、淄博、烟台、潍坊、泰安、威海、德州、日照等 9 个城市。

（据《中国文化报》，2013 年 10 月 12 日）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北京峰会开幕

10 月 20 日晚，首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北京峰会在首都博物馆隆重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士祥主持。

王安顺致辞说，本届峰会以“魅力创意 美丽城市”为主题，集中研讨创意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等内容，将为北京带来先进的理念、丰富的知识与难得的合作机遇。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和有益做法，持续深入推进文化创新，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让创意更深地融入城市建设、服务市民生活。

袁贵仁致辞指出，当今世界，资源环境对发展的约束日渐增强，建设创意城市，走有特色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发展之路是必然趋势，教育在其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创意城市网络适应了时代要求，必将对世界城市的发展起到重要引领作用，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美丽、和谐。

伊琳娜·博科娃致辞表示，北京既是传承了千年文化传统的古都，也是一座现代文化艺术与创意蓬勃发展的世界城市。相信通过北京峰会，将会推动世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据《北京日报》，2013 年 10 月 21 日）

■《2013 年中国中小城市绿皮书》发布

10 月 21 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小城市经济发展委员会、东北亚开发研究院等单位联合举办的《2013 年中国中小城市绿皮书》发布会暨中小城市新型城镇化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绿皮书指出，我国中小城市及其直接影响和辐射区域城市化率仅为 35. 1%，未来 20 年内，中小城市将成为提升城市化质量、推进城市化加速进行的主要战场。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速，几乎是世界城市化同期速度的两倍。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镇化程度总体上仍然比较落后，2000 年至 2012 年，我国城镇化率由 36. 2% 提高至 52. 6%。其中，中小城市及其直接影响和辐射区域的城市化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仅为 35. 1%。

根据预测，2020 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 60. 34%，届时全国将有 8. 37 亿人生活在城镇中。与大城市、特大城市、巨型城市相比，中小城市人口压力相对较小，在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提供等方面可以做到游刃有余。由于大城市用地成本和人力成本高企，加之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中小城市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将进一步提升。

（据新华网，2013 年 10 月 22 日）

■ 2013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举行

10 月 12—13 日，主题为“转型与创新”的 2013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在广

州举行。论坛由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办，财讯传媒集团、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协办，香港南丰集团、能兴(控股)集团承办。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指出，中国已经进入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当前，中国城市既面临着数量增加的问题，又面临着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和治理等方面质量不高、城市发展不可持续的严峻挑战。论坛旨在推动准确理解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沿理念，破解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难题，把握可持续发展带来的重要机遇，探讨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管理。

（据城市中国网，2013 年 10 月 15 日

■ 艾丽丝·门罗获 2013 年诺贝尔文学奖

北京时间 10 月 10 日晚 7 点，2013 年诺贝尔文学奖在瑞典揭晓，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第 13 位女性获奖者，颁奖词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

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出生在渥太华，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安静的城市度过。她的小说写的都是这个城市郊区中上演的平民爱情、家庭日常生活，而涉及的却都是和生老病死相关的严肃主题。这个女作家的笔触简单朴素，但却细腻地刻画出生活平淡真实的面貌，简单的文字带来丰厚的情感，恰好显示了文学最本质的能量。很多人把她和写美国南方生活的福克纳和奥康纳相比，而美国犹太作家辛西娅·奥齐克甚至将她称为“当代契诃夫”。很多欧美媒体都毫不吝啬地给了她“当代最伟大小说家”的称号。有媒体认为，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门罗，实际上是在向短篇小说致敬。

（据凤凰网，2013 年 10 月 11 日）

■ 中国网络媒体论坛举行

10 月 30 日，主题为“网聚正能量，共筑中国梦”的中国网络媒体论坛举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在致辞中强调，主流新闻网站和重点商业网站作为传播正能量的主力军，要充分发挥引领作用。

作为全国互联网站中的“大哥大”，主流网站和重点商业网站应自觉在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传播正能量是总要求、建设一支忠于党和人民的强大队伍等方面，做好示范和带头作用。要求主流新闻网站和重点商业网站带头汇聚正能量，共筑中国梦，并不是说从此之后网络媒体就不能有批评监督的负面声音，也不是说互联网就必须“一片和谐”，而是指网络媒体应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多做有益于国家民族社会进步的客观报道。在贬的同时，更要有扬；在曝光阴暗面的同时，更注意多给人以鼓励、温暖和阳光。

（据新华网，2013 年 10 月 30 日）

3. 媒体聚焦

■“鬼城”来袭：畸形城镇化发展需反思

编者按：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各地出现了很多高标准建设的新城区，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新城区空置率特别高，白天街道空无一人，夜晚城区漆黑一片，被形象地称为“鬼城”。自鄂尔多斯之后，中国“鬼城”不断见诸报端，甚至有人认为，“在中国的地图上，鬼城已经遍插旌旗”。面对层出不穷的“鬼城”，我们也该从畸形的城镇化发展中吸取一些教训了。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人口的聚集是一个自然过程。而在中国，众多新城区却是以行政主导的方式建立起来，是一种违背自然规律的产物。中国的“鬼城”多处在内陆地区某些规模较小的城市，除土地、房屋之外鲜有“经济”，只有华丽的“城”，却没有相互交织、超越家庭之上的社会联系和交易行为，形成了有城无市、有人无气的冷清局面。这显示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大缺陷——地方政府盲目追求 GDP。他们罔顾市场因素，以为划个圈圈，企业就会跟着往里跳，分不清什么事该干、可干与能干。城镇规划不完善，小区周边配套建设不健全，没有产业，也令居民无法立足，这种并非以产业为支撑自然聚集起来的城市，逃脱不了成为鬼城的悲剧。(据杜猛：《鬼城论》，《中国经济报告》，2013 年 10 月 12 日)

地方政府如此热衷造新城，原因何在？有文章分析道：首先，事权和财权的不对称，逼出了“土地财政”。其次，干部调动频繁，逼着干部大干快上、早出政绩、早出形象。再次，农村和城市土地的巨大差价，使地方政府开发新区的热情远远高于改造老城区。(据屠海明：《新城变“鬼城”的更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新闻晨报》，2013 年 9 月 17 日)也有人认为，新城建设过热，根子在于各地对中央的城镇化政策理解有偏差。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推进城镇化发展，但城镇化绝不是钢筋混凝土的简单堆砌，它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遗憾的是，目前一些地方在城镇化的路径选择上，更偏重于城市空间扩张和土地开发，因为这样推行起来相对更容易，见效更快，但副作用也比较大，很容易造成“烂尾工程”。(据《大跃进式的“造城运动”蕴藏风险巨大》，《人民日报》，2013 年 10 月 19 日)目前很多官员对城镇化的认识过于理想化，城镇化规划基本属于锦上添花，都是给富人做的规划，没有穷人的空间。而真正的城镇化应该考虑怎样解决农村人口在城镇的生存和就业问题，以及基本的公共服务问题，而不能建想象中的“空中花园”。另外，城镇化改革正面临着土地财政依赖、户籍管理难突破、行政管理制度固化、认识惯性等一系列传统惯性的挑战。(据《中国式造城运动致新城变“鬼城”盲目扩张蕴风险》，赢商网，2013 年 10 月 20 日)

要解决当下的“鬼城”现状，地方政府是关键，需要因地制宜，找到一条适合自身

发展的路，而不是扎堆盖房子。任何城市推进城镇化都要有产业支撑。产业没有培育起来，缺乏就业岗位，人口就很难聚集起来。(据《中国“鬼城”引发的城镇化迷局》，中国中小企业信息网，2013 年 10 月 10 日)还有文章提出，不管是搞政绩工程还是盲目跟风逐利，缺乏合理规划和根本驱动才是造成“鬼城”现象的主因。要变“鬼城”为繁城，提升内驱力才是关键。

(据顾慧妍：《“鬼城”破解之路 把握城市内驱力》，凤凰网，2013 年 10 月 10 日)

■“土豪”重现：网络热词折射出时代困境

编者按：近来，沉寂了数十年的“土豪”一词在网络媒体中卷土重来，一时间，“和土豪做朋友”、“为土豪写诗”成了最为时髦的文化现象。这既体现了网络的恶搞精神，也显示了民众对于自身处境的认知和调侃。

老式“土豪”名副其实，是依附于“土地”的“富豪”，而新“土豪”最初是指网络游戏的人民币玩家。非人民币玩家玩游戏，往往只花电费、网费和时间，其在游戏中的等级、装备、宠物等均靠在游戏规则内按部就班地获取；而人民币玩家则不同，可以随便花成千上万人民币买来游戏中的等级、装备和宠物。后者看前者，穷得只剩下时间；前者视后者，无脑烧钱的土豪。“土豪，我们做朋友吧”和“为土豪写诗”，这两句话充满了“吊丝”们的自嘲、他嘲与讽刺，是“吊丝”们在面对沉重现实时，明知不可能却还自娱自乐的表达。老“土豪”因欺压百姓、鱼肉乡里而可恶可恨；而新“土豪”却因出手阔绰、有追求无信仰而可怜可悲。(据李计伟：《“土豪”的游戏人生》，《新京报》，2013 年 10 月 18 日)

“土豪”被广泛接受和传播，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在于，人们发现可以把这个词当作一个非常贴切的身份标签——在网络游戏中，“土豪”指的是无脑消费的游戏玩家；在现实世界里，“土豪”则是“富而不贵”群体的代名词。透过网络流行语这种文化现象，我们能窥见一个社会的民众心态。“土豪”这个词的流行，生动地映照出一些新富群体的“暴发户心态”。而当“土豪”成为人人调侃的对象时，那些被贴上“土豪”标签的群体，也有必要反思一下该如何改变富而不贵的现状了。(据汤嘉琛：《“土豪”何以成为网络热词》，《光明日报》，2013 年 10 月 16 日)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不少人完成了财富的原始积累，但却尚未拥有驾驭金钱的能力，尚未真正懂得财富的意义，最终沦为引领社会价值倒退的负能量。按照全球致富的规律，富人的进化需要完成从富到贵、再到雅的艰难跨越，这需要时间。但在贫富差距日益加大、阶层固化业已形成的中国，他们必须提速，完成财富之上的责任、信仰的建立，否则只会为全社会的仇富情绪火上浇油。(据石述思：《“土豪”卷土重来之忧》，《工人日报》，2013 年 10 月 13 日)

也有文章注意到，在这场只有观众的狂欢里，主角的“土豪”事实上是缺席的。一方面，恐怕不会有人当着全天下的聚光灯，公然跳出来承担“土豪”之名；另一方面，

“土豪”本是一个以多对少的强势命名，这种变味的表达，本身就暗含着伤害的风险。“土豪”走红，有三点值得反思：一是它反映了人们对目前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一种形象化认识。二是它暗含了人们对公平、公正的渴求。“土豪”在过去是有钱有势之人，而现在一些富豪阶层的致富途径却并不光明，这种特权是被人们痛恨的。第三，“土豪”背后也有一种仇富情绪，人们习惯于将主观问题客观化，一味强调不公，而忽视自我反思。

（据《土豪在哪里》，《三秦都市报》，2013 年 10 月 23 日）

4. 尖峰观点

■ 于建嵘：新型城镇化：权力驱动还是权利主导

以城市化的动力为标准，我们可以将城市化、城镇化分为两种：一种是在保障公民权利的前提下由市场驱动的城市化，可以简称为权利主导的城市化，它以人力、资本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公平交易为基本特征，是在确定产权基础上个人自愿合作的城市化；一种是权力驱动和支配的城市化，政府是主要推动力量，它伴随着大量资源浪费和政策失当。

当前国内各地的城镇化思路与实践是一种权力驱动型城镇化，主要着眼于通过城镇化推动经济发展，却缺乏相关制度创新，忽视市场主体的自主性，缺乏对农民合法权益的有力保护。城镇化对许多农民而言是一种被动城镇化。许多地方政府采取压榨农民权益的方式攫取巨额卖地收入，不少地方政府以“公共利益”之名侵犯农民的土地和房屋，官商勾结、暴力征地与拆迁屡见不鲜。

农民的市民化不是称呼上的改变，而是涉及户籍、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等全方位的制度改革，需要政府进行一系列配套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户籍制度改革，而户籍制度改革首先应从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入手。土地、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联动改革既能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又能让更多的劳动力分享经济集聚的成果，这样的城镇化之路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城镇化是结果而不是手段和途径，城镇化不应沦为经济增长的工具，我们不应过分迷信政府对经济的作用，要尽量减少政府作为经济主体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权利主导型城镇化是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它通过立法形式赋予包括农民在内的每个公民以应有的权利，通过公正的司法体系保障每个公民的权利不受任何个人或组织的侵犯。坚持权利主导型城镇化才能支撑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城镇化应该以人为本，应该充分尊重农民的权利和主体性，应该在尊重各方产权的基础上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政府的角色应该是维护包括农民在内的各主体的利益和权利，提供公平的市场环境和公正的司法裁决。应该告别盲目崇拜经济发展的老思路，应该将制度建设和权利保护摆在更为优先的位置上，否则，后果将难以预料。

（据于建嵘：《新型城镇化：权力驱动还是权利主导》，《探索与争鸣》，2013 年第 9 期）

■ 辜胜阻、李睿：城镇化发展须防五大误区

将经济发展的潜在内需转变为现实动力，实现城镇化可持续健康发展须防五大误区。

第一，要防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防城镇化缺乏产业支撑，避免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的“拉美化陷阱”。研究表明，当前巴西的城镇化率近90%，然而由于城镇化与产业发展相脱节，导致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形成大片贫民窟。我国在城镇化进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盲目追求人口快速城镇化和土地高速非农化而导致的城镇化与产业发展相脱节的现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鄂尔多斯，耗资50多亿打造的面积达32平方公里的内蒙古康巴什成了一座无人居住的“鬼城”。

第二，要防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避免地方一哄而起搞大跃进，一味追求城镇化的高速度和规模扩张，陷入“速度至上陷阱”。近来有地方片面理解城镇化，采取行政手段，征用农地，使得人口快速城镇化、土地高速非农化。这种“大干快上”的做法缺乏冷静思考、科学抉择和合理规划，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很可能欲速则不达。

第三，要防城镇化的“房地产化”，避免过高地推高房价，陷入“卖地财政陷阱”。据财政部统计，2011年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超过3万亿元，相当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80%以上。城镇建设过度依赖土地出让金使得地价不断攀升，过高地价又成为房价过高的重要原因。据测算，在房价的四项主要成本中，地价占四到五成，而建筑成本则不足两成。

第四，要防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消灭村庄，大量农民“被上楼”，陷入“掠夺式发展陷阱”。农民自身上楼了，其家禽牲畜却无法上楼；“被上楼”农民的生活方式改变了，耕田种地的劳动方式却没有改变。这实际上反映了地方政府以地生财、过度依赖土地红利的问题。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土地资源日益紧缺，原有“征地—卖地—收益”的粗放式土地经营和使用方式不可持续。

第五，要防特大都市“大城市病”，避免重物的城镇化而轻人的城镇化，陷入“高楼林立而居民幸福感下降、特大城市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粗放开发陷阱”。中国城镇化在高速发展的进程中涌现出一批超级城市和特大城市，导致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用水紧缺等“大城市病”。“大城市病”的出现不仅影响了城市功能的正常发挥，降低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反映了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不可持续风险。

（据辜胜阻、李睿：《城镇化发展须防五大误区》，《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3年第10期）

■ 刘洁、苏扬：北京的城市病并非人满为患，而是人挤为患

很多人认为北京的城市病肇因于人多，但我们认为，北京的城市病并非人满为患，而是人挤为患。如果从整个行政区的人口密度来看，北京市的人口密度与世界其他大城市相比并不高，与国外以某个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相比，人口总量也不异乎寻常得多。例如，东京都市圈约13500平方公里（建成区约5000平方公里），近3500万人口；

北京全市16410平方公里(建成区约1300平方公里)，近2100万人口。但是，如果单从中心城区建成区的人口密度来看，其人口密度则高得惊人。首都功能核心区面积为92.4平方公里，人口为216.2万，人口密度高达2.34万人/平方公里，比东京和纽约完全城市化地区1.45万人/平方公里和1.05万人/平方公里高出许多。

北京市中心城区的人口过度集聚使得市中心人口拥挤，资源、环境、交通的压力非常大，相关城市病治理起来相当难。然而，人口聚集并不必然导致人口拥挤，造成人口拥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北京市人口集聚与经济集聚没有协同发展，人口分布不均衡。北京市的人口高度聚集于中心城区的建成区，仅占全市面积不到8%的中心城区建成区中集聚了全市接近80%的常住人口，致使人口集聚和人口拥挤同时出现，从而诱发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和住房困难等城市病。还应该注意到，北京的中心城区还存在较大的人口昼夜比，即有相当多的人尽管没有居住在中心城区，但大多数活动仍然在中心城区，这种情况正是大规模潮汐式交通的成因，而超负荷的潮汐式交通必然引发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

北京市人口分布之所以如此不均衡，主要在于不合理的城市发展方式和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分布不均衡。北京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单中心发展：北京城八区面积只占全市总面积的8%，却承担了北京市几乎全部的市级以上功能。虽然新城人口增长不断加快，但就业单位仍然集聚于中心城区，新增人口中居住在本地、就业在城区的比例较大，就业与居住人口分离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也许药不对症：近年来北京市公共交通发展迅速，领先全国。然而快速的轨道交通并没能很好地缓解交通拥堵，相反由于大大缩短了中心城区和新城之间的距离，使得职住分离的现象更加严重，诸多地铁车站的人流“拥堵”就是明证。

综上所述，缓解“城市病”的关键在于避免人口在中心城区高度集聚，促进人口均衡分布。首先，要通过产业规模、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的调整，疏散中心城区的功能，促使产业集聚与人口聚集协同发展。第二，要均衡配置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尤其要重点疏解中心城区的优质教育和卫生资源，这样才可能使新城真正留住人。第三，北京的新城既需要有疏解北京中心城区人口的功能，还需要在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城市群中找准定位，实现产业差异化发展，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产城同步发展。

（据刘洁、苏扬：《从人口分布的不均衡性看北京“城市病”》，《中国发展观察》，2013年第5期）

■ 丹尼·罗德里克：过早开始“去工业化”的危险

工业化是多数发达经济体取得今天成就的必由之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服务业逐渐取代了制造业的地位。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制造业的就业比率在一战前约为45%，之后下降到只有30%多，目前，制造业只占英国就业总量不到10%的份额。不过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模式已经与其有很大不同——不仅工业化本身进展缓慢，而且去工业化的开始也比发达国家早得多。比如过去10年来发展势头较好的两大新兴经济体

巴西和印度。巴西的制造业就业比率从1950年到1980年几乎没有变化，仅仅从12%上升到15%。20世纪80年代后期，巴西开始去工业化，该国近来的经济增长几乎没怎么阻止或逆转去工业化进程。印度的情况更令人意想不到：制造业就业于2002年仅仅达到微不足道的13%，之后开始下降。身为制造业大国的中国，制造业就业率也不仅明显偏低，而且一段时间来一直在下降。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峰值的15%以后，就一直维持在这一水平。

过早去工业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还有待全面论证。在经济领域，很显然，过早去工业化会阻碍经济增长，导致发展中国家迟迟无法与发达经济体会合。社会政治后果不那么容易预测，但却可能同样重要。持续民主政体是持续工业化的产物：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纪律严明的政党和围绕左右中轴展开的政治竞争。劳资双方的斗争史造就了妥协与节制的习惯——制造车间是上述斗争的主要场所。鉴于去工业化进程的提早出现，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在实现民主和善政的过程中另外开辟一条未知的、也可能更加崎岖的道路。

（据丹尼·罗德里克：《过早开始"去工业化"的危险》，《南风窗》，2013年第22期）

■ 孙光英：拉美城市化过快发展的负面效应值得关注

据联合国人居署2012年8月发布的《拉美城市发展报告》，拉美有8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城市化水平甚至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然而，拉美国家的城市发展不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却不能为其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条件，从而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城市病"，并最终危害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拉美与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许多情况相似，拉美国家"过度城市化"的教训值得我们引以为戒。

（一）应控制城市规模，防止"大城市化"。在实现"城镇化"的过程中，应当限制规模，防止将城镇变为小城市，小城市变成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又扩张为大城市。如果不加节制，到一定时候就会面临资源、环境及各种社会问题的严重困扰，并为此付出高昂代价。

（二）城市化应当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我国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留守在农村的基本上都是老人和儿童，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一些地方甚至土地落荒，无人耕种，这对于我们这个土地紧缺、粮食需要大量进口的农业国来说，在发展战略上是值得深思的。

（三）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努力解决进城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我国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大多从事低端服务业，如城市建筑、餐饮住宿、废品收购等，其数量规模之庞大早已远远超出城市的接纳能力。为此，要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并举，扩大非正规就业是解决城市就业问题的一条重要渠道。

（四）要防止出现"贫民窟"现象。我国目前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是以租赁住房为主，同时又不属于城镇住房保障制度规定的保障对象，长期下去，恶劣的居住环境会使农村

进城人口产生越来越大的心理落差，不利于社会稳定。

(五)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合理引导和调控人口流动。我国目前在人口管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难题是：城市常住人口过度膨胀，流动人口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不仅给城市的就业、交通造成巨大压力，而且给城市管理带来严重困难。政府如果不及时制定相应政策，对流动人口进行合理的限制和调控，大城市的管理难度会越来越大，各种“城市病”会越来越严重。

（据孙光英：《拉美城市化过快发展的负面效应值得关注》，《新华月报》，2013 年 10 月下半月刊）

■ 皮三：喜羊羊的“粗俗暴力”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分级问题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关于国产动画的新闻好像总是分为两极：要么是朝阳产业、扶植政策、动漫节、分钟数、成交量屡创新高，要么就是出现各种低劣到无耻的动画片遭人耻笑。为什么在一个行业内总会出现天堂和地狱般的两极评价呢？从最近一则关于动画的新闻，或许可以解读出一些真实的困境——报道说《喜羊羊》和《熊出没》被《新闻联播》点名批评，理由是暴力和粗口。

从行业角度，我肯定甚至佩服《喜羊羊》和《熊出没》的市场和商业能力。在经历了大规模的政策扶植后，全国产业基地和烂动画片数量相互攀升，再创新高，竟还能有这样少数几个在市场获得成功的动画产品，实属不易。但说实话，我个人不喜欢，原因有两个，一是动画人的职业惯性，认为这两部动画片创意和制作都很粗糙。其二是我也有孩子，担心他看了动画里的暴力和粗口会受影响，更担心他从小就审美低下。

即便如此，我也不认为，我就有理由指责这些动画企业和创作者道德水平低下，尤其不认为任何机构有权仅仅凭借道德判断，就禁止或封杀一部作品。人在创作中，有各种可能，有的专心修身度人，有的唯利是图，有的则纯粹表达个人趣味……让每种声音都能表达，才能让想象和创造有自由的土壤，才能让一个行业良性发展，而不能靠这个行业里的人良心发善。我这个观点会有人问，那你说怎么办？很简单，国家相关部门设立影视和动画分级制度。

没有分级制的现状，作用在观众身上就是——把小孩当大人，把大人当小孩。孩子很容易看到各种不适合的东西而早熟失真，而大人却因为不应有的限制而变得幼稚愚蠢。没有分级制的现状，作用在作者身上就是——把自己变残废，把观众当傻子。本来创造和想象应该是自由无疆的，但却因为审查模糊，作者们不自觉地产生心理暗示的恐惧感，甚至连思维的懒惰和不作为也有了好借口。没有分级制的现状，作用在整个行业或市场就是——把行业搞低端，把市场变浑水。正因为没有清晰明确的分级制，才会有各种道德判断。同样一个“喜羊羊”，品质在提高，可四年前被《新闻联播》说成“老少咸宜”的动画好模范，现在却成了“恶俗暴力”的行业坏典型。这种尴尬，不能说是我们的道德比“喜羊羊”进步得快，只能证明道德话语权太容易被个人好恶影响，左右摇摆。

（据皮三：《喜羊羊的“粗俗暴力”不是道德问题 是分级问题》，凤凰网，2013 年 10 月 21 日）

■ 胡凌：网络传播中的秩序、谣言与治理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网络传播秩序一直是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并成为评估社会稳定风险的一个指标。目前来看，尽管政府对治理网络传播秩序做出了相当的努力，但对包括微博在内的新媒体形式的监管仍显力不从心。这主要是因为微博用户众多，并持续增加，通过运营商一类的外界力量不能保证秩序从内而外形成。管理者面临的困境在于，政府对网络信息的监管既面临着国内民意的压力，又担心西方意识形态的传播，结果往往是对“最坏状况”的想象和假定导致做出某些极端的整治措施。

以微博为例，近来讨论最为激烈的便是网络谣言。从内容上看，政治性谣言、涉及政府官员的谣言、商业推手谣言以及缺乏科学知识的谣言更容易得到广泛传播。治理谣言可能和言论自由发生冲突。如果用户并不清楚自己的言论能够带来哪些后果，受“最坏状况”思维影响的事先禁严的预防原则就容易过度，对言论施加了不必要的影响。所以，在没有可预见的现实危害之前不宜对网络言论加以限制，否则会导致自我审查、分享和创新意愿的降低。我们需要综合考虑政府治理方式与其他重要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

政府应当鼓励各种媒体、社会团体和个人提高发布真实信息的能力，特别是涉及公共利益的信息，要动员社会资源以降低其成本。就事后救济而言，政府也应当尽量将关于个人的谣言和诽谤交给私人主体处理解决，把有限精力放在培育良好的信息环境上面。相反地，目前采取的专项整治措施，其效果值得探讨。技术上的封堵和追踪尽管可行，却十分单调、粗暴，没办法回应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微博实名制政策施行以来，尚没有专门研究微博上的谣言、诽谤和不良信息是否得到抑制。这一政策可能的直接后果是减少了僵尸粉的数量，降低了商业谣言和诽谤出现的概率，净化了网络公共空间。这一政策还可能减少实名注册的用户，但这未必能在整体上降低谣言的规模，也无法改变谣言传播的结构，更无法消除谣言出现的土壤。

（据胡凌：《网络传播中的秩序、谣言与治理》，《文化纵横》，2013 年第 5 期）

5. 机构动态

■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数据中心发布中国城镇化调查数据

10 月 27 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举行中国城镇化调查数据发布会。会议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常务副主任李宏彬教授主持，谢维和副校长出席并作了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联席主任、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教授就调查数据中的重要发现向与会者作了详细介绍，并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

这次发布会公布了四点重要发现。第一，中国户籍城镇化率非常之低，非农户籍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仅为 27.6%。第二，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大流动的时代，强流动特征不仅表现为农民工的流动，城镇社会内部的流动率也很高。数据显示，当前

我国农业户籍人口的流动率为21%，非农户籍人口的流动率达到23.7%。第三，征地、拆迁波及16%的家庭，而征地拆迁后提供就业机会和城镇社会保障的比例较低。第四，农民工弃农比例较高，留城就业和定居的意愿强烈。农村本地居民打算以后还自己耕种承包地的比例下降为79.1%；流动人口中打算以后还由自己耕种承包地的比例仅为47.7%。

（据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网站，2013年10月31日）

■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召开第三届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学术研讨会

10月26日，第三届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召开。会议主要内容为：汇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最新研究成果；就文化发展战略、国际文化产业竞争力战略、数字内容产业战略、文化企业发展战略等展开深入的学术研讨。会议由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向勇主持，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财经大学、上海社科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二十位专家发表了演讲。

向勇副院长汇报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课题中期检查后的研究成果，重点介绍了课题成果之一《中国文化产业现状与趋势调查报告》。出席研讨会的其他专家也就“文化产业众筹模式”、“国有文化经济战略性调整”、“我国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等主题发表了演讲，对文化产业宏观格局与具体行业做了分析。

（据意象网，2013年10月28日）

■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召开：“思想的旅行：从文本到图像，从图像到文本”国际学术研讨会

10月19日—20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思想的旅行：从文本到图像，从图像到文本”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来自海内外的60多位学者出席了此次思想的盛会。会议正式开始前，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李春青教授、山东文艺美学中心主任曾繁仁教授、美国阿拉巴马大学教授Richard Rand分别致辞。

本次大会的突出意义体现在，为多元化的文学理论界、为老一辈学者与新一代学人提供了一个饱含“对话”精神的自由言说空间，增进了学者对具体图像艺术(如电影、绘画、纪录片)的关注，以及对“文本”“图像”理论及其关系的探讨。

（据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网站，2013年10月31日）

■ 网络文学大学正式成立，莫言任名誉校长

10月30日，中国首家培养网络文学原创作者的公益性大学——网络文学大学正式成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担任名誉校长。网络文学作者将由纯粹“自发式”的创作

阶段步入“职业化”进程，除了接受文学理念和创作技巧的系统培训，还有机会获得莫言等文学大师的创作指导，并能与传统作家交流学习。

据中文在线董事长兼网络文学大学校长童之磊介绍，网络文学大学是在中国作家协会的指导下，由中文在线发起，并联合17K小说网、纵横中文网等知名原创文学网站共同成立的，它将为全国网络文学作者提供免费培训。据了解，网络文学大学汇聚了各大文学原创网站的资深编辑，不仅能为作者提供实战指导，还充当了“星探”的角色。

（据人民网，2013年11月1日）

6. 海外视野

■ 韩国的“压缩型”城镇化之路

韩国的城镇化与韩国经济的腾飞并行，作为韩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载体，它不仅有效调整了经济发展的方向，还创造和激活了庞大的内需。在短短30年的时间里，韩国基本上完成了城镇化进程，相对于欧美国家，韩国的城镇化之路可以用“压缩型”来形容，这不仅体现在时间上，也体现在空间上。

韩国的城镇化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起步和成长期。1960年一般被视为韩国城镇化进程的起点，因为在这一年，韩国政府着手治理因人口大流动带来的社会混乱，并开始布局经济现代化规划。但真正成长，是在1968年至1977年，在这一时期，韩国农业生产引入了机械化，使得农村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同时实施的四次经济开发计划在以首尔为首的20多个地区设立了各种工业园区，成为农村劳动力到城市就业的重要契机。这期间的城镇化呈现向首都圈和东南海岸集中的态势。二是加速期，时间段从1977年至1990年，这一时期也被称为韩国经济的第二次“起飞”时期。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韩国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城镇化开始从大城市向一般城市和新城市分散。三是后城镇化期，时间从1990年至今。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韩国城市人口的增速明显放缓，由原有的每年百万左右下滑到45万，乃至2000年后的每年35万。

韩国高速增长的经济模式必然要求优化配置资源，高度集中的工业布局有利于发挥集聚效应，也要求生产要素向城市高度集中。韩国的大城市、新城市基本集中在交通枢纽(大田、大邱)、沿海港口(釜山、仁川)、首都圈(安山、城南、高阳等)和工业中心区(马山、昌源等)。韩国在经济现代化起步时面临资源和资金的不足问题，只能选择地理位置和发展条件更优越的地区优先布局，这直接导致了后来城镇化发展的不均衡。目前，韩国四分之一左右的人口集中在首尔，而包括首尔、釜山、大邱、仁川、大田、光州在内的6大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交通建设是城市发展的命脉，应该说韩国在交通规划和道路空间利用方面有自己的特点，基本实现了高速公路一日生活圈化。但由于韩国的城镇化发展过程主要集中在机动车未普及时期，因此老城区道路狭

窄，上下班时间市内道路拥堵严重。此外，城市人口超短期间、超高密度的集中使得土地价格暴涨，房地产泡沫严重，目前，巨额家庭债务和房地产低迷是制约韩国内需市场的最主要因素。

（据杨明：《韩国的“压缩型”城镇化之路》，《经济日报》，2013 年 10 月 8 日）

■ 日本城镇化的得失

“二战”后，日本城镇化驶入快车道，1955 年城镇化率上升到 56%，2005 年达到 86%，2011 年，日本的城镇化率已达到 91.3%，远远超过了东亚地区 55.6% 的平均水平。城镇化深刻改变了日本，提高了日本民众的生活水平，但也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和各种“城市病”。

日本城镇化的突出特点是高度集中的都市化。其原因是日本国土面积狭小，人口稠密，开发空间有限，依靠工业布局和出口型经济拉动，从而使日本的人口、产业和城镇高度集中在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大都市圈，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 14.4%，但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却占全国的 50% 以上。

工业化是城镇化的核心推动力，随着产业的升级，日本城镇化也展现出不同的形态。50—70 年代，日本工业处于黄金发展期，工业促进了城镇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集聚。70 年代以后，日本居民渐渐向中心城市周边的郊区或卫星城转移，从而推动了大城市郊区及周围城市的发展。90 年代，第三产业成为日本城市发展的新动力，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在全部就业人数中所占的比重持续上升，至 2010 年已升至 66.5%，城市也随之由产品制造中心向信息中心、金融中心和服务中心转变，这个重要转变支撑着日本城镇化水平继续提高。

但日本高度集中的都市化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过密过疏”，即大都市等出现人口过密、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等一系列问题；而农村却出现劳动力不足、高度老龄化、缺乏产业支撑等问题，农村甚至一度出现了新娘短缺。城镇化，最受益的行业当属房地产业，人群大量涌向城市，城市房地产日渐火爆。房地产繁荣，又促进了日本人资产的增值，在人人皆是百万富翁的自信心理下，旺盛的消费又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发展。但房地产从来都是一柄双刃剑，1991 年，日本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截至 2002 年 7 月 1 日，日本的土地价格已连续 11 年下跌。泡沫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导致日本经济 10 多年来一蹶不振。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野口悠纪雄说：“日本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要陷入曾经有过的那种拒绝相信的状态。泡沫期间，人们不相信价格会下跌。”他说，上个世纪 80 年代，日本的投资狂热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即使毫无用处的土地，各个公司也全力争夺。

（据冯武勇、郭朝飞：《日本城镇化的得失》，《决策与信息》，2013 年第 05 期）

7. 研究院之声

■ 我院与民进中央召开“微文化”主题座谈会

10 月 16 日，我院与民进中央组织召开“微文化”主题座谈会。参会的民进中央代表包括首都师范大学校长、民进中央副主席刘新成，北京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胡军，首都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王德胜，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盛大文学 CEO 侯小强，北京天智通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李极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技术教育与实验中心主任殷强，民进中央参政议政部部长陈鸣，民进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梦溪。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首席专家陶东风教授及我院其他研究人员出席了座谈会。主持人胡军教授介绍说，此次座谈会的目的在于对方兴未艾的“微文化”现象进行讨论，集思广益，以期在学术研究和实践操作方面深刻认识这一现象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

陶东风教授首先介绍了文化研究院的工作特色与研究重点。他说，建院以来，文化研究院始终坚持“三个保持”：一是保持与世界城市发展的最新趋势相一致；二是保持与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相一致；三是保持与新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和新文化类型的出现相一致。研究院关注的重点学术问题有：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何落实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力；政府如何投资和管理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如何协调官方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价值观的关系等。他还就“微文化”现象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强调，鉴于“微文化”对社会各领域的显著影响，有必要在理论上关注这一问题，举办相关学术论坛，推动进一步研究。

天智通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CEO 李极冰在发言中提出，微文化将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组，以及各种资源的重新分配，也将从根本上推动人的变化。盛大文学 CEO 侯小强介绍了网络文学网站微支付的运行现状，他认为，微文化的兴起主要有两个原因，即技术的更新和“80 后”的文化人格。文化研究院郑以然博士则从空间理论出发，比较了中国微博与美国 Twitter 的不同。张颐武教授从政务微博的信息发布切入，认为微文化已经被主流社会接受，微文化的流行是中国中产阶层兴起的结果。殷强教授提出，应特别关注微产业从业者。最后，刘新成教授对本次座谈会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我们应该从多个角度开展“微文化”研究，不仅应关注“微文化”与日常生活、文化消费、法制、价值体系、协商民主、传统学术、意识形态以及新阶层之间的关系，还应开展“微文化”的比较研究。

（本期摘编人：朱楠、郭云娇）

主　　办：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主　　编：陶东风　邱运华
执行编辑：陈国战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83 号，100089
电子信箱：wenhuazhanlue@ gmail. com
联系电话：(010)68903449、68903576

(内部参考)